

Research on the Demand Changes and Supply-sid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ake the fou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s an example

Shanfan Du

Beijing Ganyin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dvances into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structural shift—from a humanities-oriented approach to an application-driven one. Grounded in demand-side analysis, this study focuses on four representativ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Vietnam, Indonesia, Thailand, and Malaysia—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i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scale, and talent demand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ditional gener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an no longer meet the surging “professionalized” and “strategic” talent demands in fields such as economy and trade, infrastructur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ourism.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a supply-side reform pathway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e core lies in promoting a shift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from “general Chinese” to a “modular ‘Chinese Plus’” model, developing country-specific and field-oriented teaching resources, establishing a school-enterprise-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vigorously cultivating “dual-qualified” and localized teaching staff, all aimed at building a new Chinese education ecosystem that precisely serves the needs of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emand-oriented; Supply-side reform; Chinese National Studies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需求变迁与供给侧改革研究——以东南亚四国为例

杜善凡

北京甘音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北京 100102

摘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沿线国家对中文教育的需求正经历从“人文导向”到“应用驱动”的深刻结构性转变。本文以需求侧分析为切入点，聚焦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四个具有代表性的东南亚国家，系统剖析其汉语教育政策、规模及人才需求特征。研究发现，传统的通用型中文教育已难以满足各国在经贸、基建、数字科技、旅游等领域激增的“职业化”与“战略化”人才需求。据此，本文提出国际中文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路径：核心在于推动课程体系从“通用汉语”向“模块化汉语+”转型，开发国别化与领域化教学资源，构建“校企政”协同育人机制，并大力培育“双师型”与本土化师资，以构建精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型中文教育生态系统。

关键词

国际中文教育；一带一路；需求导向；供给侧改革；中文+；国别化研究

1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显著提升了语言作为互联互通“铺路石”和人文交流“先行官”的战略价值（李

宇明，2015）。在这一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内在驱动力正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以往以政府主导、文化交流为主的“软需求”，转向由市场驱动、与职业发展紧密挂钩的“硬需求”（王辉，2020）。这种转变在与中国合作项目密集的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者简介】杜善凡（1980），女，中国河北三河人，本科，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国家的汉语需求分析

2.1 越南：投资与旅游双轮驱动的实用主义需求

越南作为制造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其中文需求呈现出强烈的经贸实用主义特征。

政策与规模：越南政府于2024年将汉语正式纳入小学必修课，标志着其对中文战略价值的认可。在此推动下，中文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数据显示，仅2025年第一季度，河内大学孔子学院的HSK考试报名人次就高达9941，位居全球前列。全国超50所大学开设中文专业，民办中文教育机构蓬勃发展。

需求特征：

经贸与基建驱动：中资企业在越南的投资覆盖制造、基建、IT、光伏和跨境电商等领域，催生了对于“中文+专业技能”复合型人才巨大需求。此类人才在薪资水平上显著高于普通岗位，尤其在技术、管理和贸易领域，精通中文成为职业发展的“倍增器”。

旅游市场复苏驱动：2024年，赴越中国游客突破370万人次，同比激增214%。这使得芽庄、岘港等旅游城市的酒店、餐饮、零售业对掌握基础交际中文的员工需求暴增，催生了大量短期、速成的培训市场。

2.2 印度尼西亚：战略项目与数字经济引领的“订单式”需求

印尼的中文需求与国家级合作项目深度绑定，呈现出“战略引领、订单培养”的特点。

政策与规模：印尼自2001年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来，已构建起涵盖10所孔子学院、近1500所中小学的办学网络，学习人数超50万。其政策特点是官方统筹、产教融合，通过教育部与工业部协同，联合中方语言合作交流中心与企业共建“中文工坊”，旨在将中文能力直接转化为国家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

需求特征：

旗舰项目驱动：雅万高铁的运营维护需要大量懂中文的本地技术员、调度员和站务人员，产生了明确的“订单式”人才培养需求。

资源与电商驱动：作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和电商出海重镇，印尼在新能源、矿产资源及跨境电商领域，对精通相关行业术语与业务流程的中文人才求贤若渴。一个突出的矛盾是：中资企业汉语人才缺口高达900万，而全国能流利使用中文者仅约100万，供需严重失衡。

2.3 泰国：国家战略与服务业升级融合的“中文+”需求

泰国将中文教育深度融入其“泰国4.0”战略^[1]与“东部经济走廊（EEC）”^[2]建设，需求呈现出“全域覆盖、高复合度”的特征。

政策与规模：泰国政府明确将中文定位为“经济语言”，

并将其系统纳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全国超过2000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学习人数超百万，形成了庞大的基础。

需求特征：

服务业根基深厚：作为中国游客最大的出境旅游目的地之一，泰国旅游业对中文导游、酒店服务、零售销售的需求是基本盘。

中资企业本地化深化：随着中资企业在泰投资设厂，其人力资源、财务、法务、公关等职能岗位的本地化招聘，普遍将中文能力视为重要标准。

人才需求层级提升：市场需求已从“懂中文”全面升级为“中文+专业技能”，急需既会汉语，又精通跨境电商、物流、工程技术和金融的复合型人才，直接服务于其产业升级战略。

2.4 马来西亚：成熟华教体系与产业转型对接的升级需求

马来西亚拥有东南亚最完善的华文教育体系，其需求正从“文化传承”向“经济战略”转型。

政策与规模：马来西亚拥有涵盖华文小学、独立中学乃至高等教育机构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截至2022年，全国有1302所华文小学和62所华文独立中学。HSK考生数量在2023年超过1.2万人，并持续增长^[1]。

需求特征：

中资企业青睐双语人才：约23%的华人人口为马来西亚提供了丰富的双语人才库，使其成为中资企业招聘的首选。中文能力在求职中带来显著的薪资优势。

产业升级催生高端需求：在打造区域教育中心和医疗旅游中心的目标下，以及“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动下，市场对“中文+高端服务”（医疗、教育、金融）及“中文+信息技术”等定制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

3 国际中文教育的挑战与转型方向：基于需求侧的审视

综合四国情况，需求侧呈现出三大核心趋势：职业化（与应用场景结合）、领域化（与特定产业结合）、精准化（与国别项目结合）。然而，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供给侧面临严峻挑战，表现为：

课程内容脱节：教材多以通用语言知识和人文通识为主，缺乏与对象国支柱产业和重大合作项目相关的专业词汇与场景内容。

师资能力单一：教师队伍多为纯语言背景，缺乏经贸、工程、法律等领域的专业知识，无法胜任“汉语+”教学。

培养模式僵化：以学校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在灵活性、定制化和实践性上无法满足企业和在职人员的即时需求。

本土化深度不足：教学资源和方法多从国内“移植”，

未能与当地文化、思维习惯及具体应用场景深度融合。

因此，国际中文教育的转型方向必须是从“教什么学什么”转向“需要什么教什么”，其核心是从“通用型”供给转向“精准化”供给。

4 面向需求导向的供给侧改革建议

4.1 课程与教材改革：构建“中文+”模块化课程体系

开发领域化教材：与行业龙头企业和商会合作，共同开发如《中文+跨境电子商务》、《中文+工程项目管理》、《中文+智慧旅游服务》等系列教材，内容需嵌入大量来自对象国的真实案例与工作流程。

推行模块化教学：在夯实语言基础后，开设多个“职业方向模块”，允许学习者根据自身职业规划（如电商、酒店管理、工程技术）进行选修，实现个性化、应用型培养。

4.2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校企政”协同育人生态

推广“订单式”培养：中文教育机构应主动“走出去”，与在海外投资的中资企业及对象国本土企业建立战略合作，根据企业具体岗位要求，联合设计课程，开展定向培养，实现“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

共建实习与实践基地：将企业变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建立稳定的实习与实践基地，让学习者在真实工作环境中运用语言、了解行业，实现“学用一体”。

4.3 师资队伍建设：培育“双师型”与本土化核心力量

转型“双师型”教师：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并资助现有中文教师攻读第二专业（如经贸、法律）或进入合作企业挂职锻炼，积累行业经验。同时，可引进具备行业背景的华人专家或本土专业技术人才参与教学^[2]。

加速本土教师培养：支持对象国高校加强中文师范专业建设，并通过“中文教师奖学金”等项目，选派本土教师来华进修。本土教师是实现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他们更了解本国国情与学习者心理。

4.4 教育服务模式多元化：拓展在线教育与企培服务

为满足多样化需求，国际中文教育必须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边界。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依托专业平台，开发系统化的“行业中文”在线课程（如“跨境电商汉语”、“酒店服务汉语”）。采用“录播微课+直播辅导+社群答疑”的混合模式，覆盖广大在职人群，满足其时间灵活、内容实用的学习需求。

精准开拓企业定制培训（B2B服务）：中文教育机构应转型为“企业语言解决方案提供方”。流程包括：需求诊断（与企业沟通明确岗位语言技能）、方案定制（量身定制教学大纲与内容）、专业交付与评估（派遣“双师型”教师授课，并以沟通效率提升为核心评估效果）。

4.5 科技赋能教学：构建“AI+中文”智能教育新范式

通过笔者对东南亚四国中文教育需求的观察，各国均严重缺乏高质量的本土化教师资源，为应对高质量师资短缺、教学资源分布不均及个性化学习需求激增的挑战，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AI+中文”智能教育新范式，提高汉语本土教师和企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效率。

在此，笔者给出建议

“构建与推广‘AI双师课堂’模式（祝智庭等，2021），将人工智能作为‘第二位教师’，与线下真实教师协同教学，形成优势互补。”

具体实施路径如下：课堂教学环节：在常规课堂中，AI扮演“教学助理”角色。它可以：实现精准发音纠音：通过智能语音识别技术（Li & Wang, 2022），对学生的发音进行实时评测与反馈，解决大班教学中教师无法逐一纠正的难题。

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利用AI驱动的虚拟形象或对话机器人，创设在餐厅点餐、商务谈判、项目协调等高度仿真的语言应用场景，让学生在近乎真实的语境中进行互动练习。

自动化处理机械任务：承担生词跟读、句型操练、作业批改等重复性工作，将教师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能更专注于启发式教学、文化阐释和课堂互动^[3]。

课后学习环节：AI转型为“个人学伴”角色。它可以：生成个性化学习路径：基于学生的学习数据，AI能够动态分析其知识薄弱点，并智能推送针对性的练习与拓展材料，实现“千人千面”的自适应学习（Chen & Feng, 2021）。

提供7x24小时答疑解惑：通过集成丰富的语料库和知识图谱，AI能够即时回答学生提出的语法、词汇等问题，提供不间断的语言支持服务。

实施保障：鼓励教育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共同开发面向特定国别和职业领域的AI教学产品。同时，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使其熟练掌握并高效利用AI教学工具，最终形成“AI负责标准化、规模化基础训练，教师负责创造性、情感化深度引导”的新型人机协同教学格局。

5 结语

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衡量国际中文教育成效的标准，已不再是单一的考试通过率或机构数量，而是其能否为共建国家精准培养出支撑深度合作所急需的各类应用型、复合型语言人才。

参考文献

- [1] 李宇明. 语言服务与“一带一路”[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4): 2-8.
- [2] 郭熙. 关于新形势下海外华文教育转型的思考[J]. 世界汉语教学, 2022, 36(1): 3-12.
- [3] 郭晶, 吴应辉. 越南汉语教育政策及实施状况研究[J].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2021, 6(3): 45-53.